

沙博理翻译跨文化的主体间性研究

朱安博,张慧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系,北京 100070)

摘要:沙博理的翻译具有跨文化的主体间性独特视域,跨越文化身份主体身份认证为翻译提供了特殊的理解前提,其对原作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目的语读者的尊重,彰显了翻译的主体间性,也使得他的翻译作品独具特色。从主体间性这个视角研究沙博理特殊的翻译模式,可以更好地看出译者主体间性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主体间性;沙博理;文化身份认证;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2-0073-05

沙博理(Sidney Shapiro),中文名取自“博学明理”之意。他是一位犹太裔美国人,1915年生于美国纽约,1956年加入中国国籍,具有三种文化身份的沙博理对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独有的贡献。2009年,他获“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2012年被授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协会用以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沙博理先后经历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沙博理把自己大半生的时间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跨文化翻译的身份认证

众所周知,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成为影响翻译作品文化倾向的重要因素。沙博理的翻译是跨文化翻译的典型。要知道沙博理的翻译为何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就要首先了解沙博理的跨文化身份认证。英文的 identity 本身所包含的“身份”与“特征”(the characteristics, feelings or beliefs that distinguish people from others),即区别于他人的特有的感觉或者信仰^[1]。目前,翻译已经从传统的字面翻译逐步拓展为文化内涵的阐释,因此一个合格的译者不仅要有双语能力,还要

尽可能多地了解两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就是说,作为译者不仅要通晓两种语言,还要培养其自觉的文化意识。而译者作为原作和译作的中介者,其文化身份也应该得到重新审视和定位。

全球化时代,单一、静止的文化身份在翻译中很难存在。由于翻译的跨文化性特征,只能认同和建构一种“流动性的、复合性的”文化身份。建立流动的文化身份观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根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自己的身份”^[2]。在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文化身份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文文本的生成等。“由于翻译在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意义系统里运作以及阅读受到文化制约和寓意,翻译中出现了复杂的文化移入模式,极易生变却又持续不懈。因此,结合翻译和身份、杂合和嬗变等棘手问题来研究文化移入的过程成为必然”^[3]。

作为译者,沙博理不仅熟悉美国文化,精通英语,而且还熟悉中国文化。他作为中国作品的读者,能够把握原文的文化精髓;作为译者,又能够以作者的身份照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用地道的英文表达原作的思想。他的特殊文化身份使他在翻译《水浒传》的时候,能较准确地把握原文,在保留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翻译成地道的英

收稿日期:2014-03-14

基金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改项目“经贸类院校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化窗口建设服务基地”项目的成果

作者简介:朱安博(1972-),男,安徽萧县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文为西方读者所欢迎。从沙博理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跨越文化身份认证和文化间性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中国人”的文化立场解读所译中国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以“文化间”双重身份操纵翻译,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译文表达,由此实现了作者—译者—读者的“一人三体”^[4]。

二、重视翻译中的跨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内涵不同,同一些词语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所表达的概念也就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它们的字面意义而且不能忽视它们的社会文化。翻译时不能光追求字面上忠实原文,更重要的是力求在词汇的文化内涵方面忠实于原文。沙博理认为在翻译中内容和风格都应该表达出来。在内容的传达上,首先需要熟悉故事的历史环境,了解每个人物的个性,不能逐字翻译,允许对形式稍有改动;在风格再现方面,“译者除了要透彻了解作品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人物的个性和特征、人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得同样透彻地熟悉外国的对等词语——或不如说外国最接近原意的近似词语”,“英语要近似中文原文的风采,或文或俗,或庄或谐,切不可二者混为一体。”^[5]沙博理曾说过:“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我非常喜欢我的翻译工作,这样可以阅读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一部文学作品有自己的文风,散发着自己特别的味道,蕴含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各个方面,没有文化的根基,光翻字典,是不能解决问题的。”^[6]从沙博理的翻译实践来看,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热爱是他走上中国文学外译道路的根本原因。他通过翻译认识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也认识到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难度是很大的。毕竟翻译作为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桥梁,不仅是一种符号交际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行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手段,要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等值,发挥跨文化翻译中的再创造性。

沙博理认为自己的翻译工作是把“我们的内容变成他们的话”,按照这个思路,他翻译的时候通常采用文化上的异化、语言上的归化策略。他坚持要“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4]。这是一种翻译态度:翻译来不得虚假,必须遵从“信”的

原则。这不是建立在一字一词表面的精准上,更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基础上翻译出容易让西方人接受的译文。他强调“切忌不可逐字直译”,在对原著人物个性有把握后,允许对语言形式稍作改动。他对于翻译的准则,基本上赞同“信、达、雅”的主张。他认为译者不仅需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的语言,还有其历史、文化、传统习惯。并且对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习惯等也要精通^[7]。正是对两种文化语言的熟悉和掌握,才能成就一个好的搭桥者。正是沙博理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在翻译时能较好的把握中西不同文化。沙博理被认为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了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8]。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很好地发挥了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也发挥了译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

三、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原作者和读者都是主体,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译者是联系这些主体的决定性因素。许钧把翻译主体分为广义的翻译主体和狭义的翻译主体。广义的翻译主体指作者、译者和读者。狭义的翻译主体指译者^[9]。如果没有译者,翻译就不能得以实现,因此译者在所有翻译主体间性因素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译者作为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搭桥者,是翻译活动中的主体之一,也是其中最活跃的主体。

译者的主体性,简单点说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主体的本质表现在它的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特征中,所以翻译主体译者的主体性也具有这三个特征。译者的能动性指的是译者对待译作品具有选择权,在理解原文和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对原文的理解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译者的受动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语言因素和诸如意识形态、诗学等非语言因素的制约。译者的为我性是指译者翻译的目的性。

主体间性理论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把握主体与主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张的是一种亦此亦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共存的关系。它超越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翻译有重要指导意义^[10]。翻译研究借鉴其思想,从翻译主体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同时也与其他翻译主体原作者和读者构成了主体间性的关系。由于作者与译文读者处

于不同的文化中,译者不仅要熟悉两种语言,更要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但是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语言转换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他们不是孤立的主体,而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如何协调好三者间的关系,使共在的自我在翻译中充分发挥和谐的创造作用,非常重要^[11]。总之,翻译是作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和读者主体性相互制约的结果。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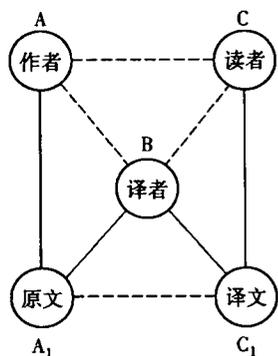


图1 三者关系图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graphs

如图所示,译者处于中间协调者的身份。从原文到译文就是翻译的过程,即图中从A₁到C₁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通过对原文的推敲,在了解源语文化的基础上把握原作者的写作思路和风格,同时要照顾译入语读者的需求。这个过程中还要受到翻译发起人和赞助人的影响,还必须有合作者的帮助。但总体来讲,一个译者在作出选择翻译作品时,他最关注的还是原作者作品的精髓和目标读者的反应。王佐良曾说:“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终完成,不能只看原作者意图或译者的意图,不能只管少数批评家满意不满意,也要看读者接受的怎么样。”^[12]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作者和读者的协调者或媒人,在综合考虑的情况下选定最好的翻译策略,使读者了解原作的精髓。如图中ABC组成的三角形,作者、译者和读者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在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主体是译者,如果译者的主体间性意识强,并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就能翻译出读者满意的作品。

沙博理作为翻译家的特殊之处是,他不仅了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精通中英两种语言。这种处于两种文化间的特性,给他的翻译带来了不一

样的视角。他对翻译模式有自己的见解,他赞同中西互补的翻译模式。他曾说:“最好的结果似乎是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团体合作完成。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充分掌握两种语言,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因此无法本能地感知一切细微差别,感受所有的共鸣,也就无法独自翻译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4]

四、从主体间性视角看沙博理《水浒传》的翻译实践

译者与作者的间性关系体现在译者既不是原作的奴隶,也不是完全脱离原作的创造者,而是作者的帮助者。译者通过对原作的阅读研究,结合原作者所处的文化社会背景,在把握原作精髓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原作的思想。“译者是原作的读者,但他不同于一般读者,他承担着原作进行传达的责任和义务。他不仅要读透原文,更要读懂读透文字背后的蕴意,因此译者的难度大于一般读者”^[13]。

沙博理的译本前七十回选用了金圣叹本,后三十回选自容与堂百回本。为了与前七十回的文字保持一致,后三十回的诗词未予全译以保持整个文脉的一致。为了使整个故事完整,他把两个版本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译本,体现了他对原作的灵活把握和对读者的尊重。

沙博理的译文保留了大量原文的中国元素。在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既忠实又灵活。例如在翻译“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花果祭仪,素馔,净食,并合一应物件”时,把香烛和素食分别翻译成了 scented candles 和 meatless food^[14]。既忠实于本意,西方读者也易于接受。他把鲁班翻译成 Lu Ban the Great Carpenter 这样就能体现出鲁班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名,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木匠。

《水浒传》是一部章回体小说,每一章前边通常都有引出正文的回前诗。沙博理翻译的时候,顾及到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省去了回前诗,因为若不删去,就会失去悬念,减少读者阅读兴趣。在译作中,沙博理把原文的一大段分成两三段,这样读者读起来更轻松。而且,他将一些冗长累赘的内容也都统统删掉了。尽量用西方读者能接受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意思。如下文例子: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15]。

沙博理译文:

Emperor Ren Zong was actually a re-incarnation of the Barefoot Immortal. [15]5

沙博理将“赤脚大仙”译作了“Barefoot Immortal”，既形象又贴切。“immortal”的意思就是神仙，长生不死者。最妙的是在译文中用“re-incarnation”这个词指明了仁宗是神仙转世，这是基督教文化里所没有的。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加上这个词是必要的。

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15]4

沙博理的译文：

What were the eight words? They were these: “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both have their stars.” [10]5

原文上半句四字下半句四字，译文也如此，而且译文中结尾压 s 韵，无论是形式上还是韵律上都做到了跟原文相近，而且 star 一词，也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因为希腊神话中有星座对应神仙的故事，所以读者看到星星一词，也容易理解文曲星和武曲星的意思。

勒菲菲尔(Lefevere, A.) 将赞助人(patronage)这一术语界定为“能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和改写的某种权力(人,机构)。”[16]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助人的意识形态会操控译者的翻译行为。沙博理译的书名 *Outlaws of the Marsh* 正是为顺应当时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变通[17]。

沙博理的翻译受到了当时“四人帮”的关注。沙博理曾在《大家》栏目上说“是宋江救了我。就是因为我在翻译《水浒传》那个时候,当时夺权的那个单位他们都不找我,因为他们都说,是他们领导之下,使这个单位出了《水浒传》,给自己贴金,所以他们不管这一派那一派,就都不麻烦我了。”沙博理最初将《水浒传》译作了 *Heroes of the Marsh*, 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四人帮”把周恩来总理比成了宋江,说宋江是英雄他们当然不满。沙博理巧妙地换了一个词,把 heroes 换成了 outlaws, 他们以为 outlaws 专指土匪,就答应了,没想到还有好汉的意思。正是沙博理对英文的精通以及对英文读者的了解,使他能够用变通的方式既保证译文对原

文的忠实,还抵制了外界强权的干扰。赞助人对译者的翻译有发言权,如选什么样的作品怎么样翻译。但是译者在与赞助人对话沟通的基础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一方面尽量表达原文的含义,另一方面照顾到读者的需要。

在翻译《水浒传》期间,外文出版社指定了汤博文、叶君健做助手,“他们的英文水平、古汉语知识和辛苦的研究工作对于翻译本书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18]。沙博理的夫人凤子是个散文家,文言文极好,在沙博理翻译《水浒传》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沙博理的翻译成果离不开背后的团队。他本人对西方的文化了解比较深,但只有在妻子和其他熟悉古汉语知识的学者的帮助下,才能完成这部承载中国文化的巨著。

总而言之,沙博理的翻译策略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点是异化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中国文化。第二点是适当变通,兼顾原文整体效果和英语读者[4]。这正是主体间性思想在翻译中应用所采取的最好策略。首先,译者既要照顾原作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又必须让读者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了解原作的思想内涵。以异化为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源语的一部分重要文化因素,但是在为读者考虑的时候尽量选择读者能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正是译者间性思想的体现。从翻译策略来看,沙博理注重于意译、交际翻译和异化翻译的策略。在处理作品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面,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理解障碍,他没有把源语文化的传播抬到至高的位置而不顾目标读者是否能够接受,也没有把目标读者奉为最重要的地位而忽略源语文化的传播,而是兼顾两种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沙博理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在翻译时有更开阔的视野。他作为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搭桥者,充分发挥了处于主体间的间性作用。沙博理对原作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目的语读者的尊重,彰显了翻译的主体间性,也使得他的翻译作品独具特色。沙博理在翻译实践中能使得翻译的各个主体间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好主体间的合作关系。

参考文献:

- [1] [英]霍恩比.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12.
- [2] 陶东风. 全球化、文化认同与后殖民批评[C]//陈定家.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00-216.
- [3] 孙艺凤. 翻译研究与文化身份[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2):22-27.
- [4] 任东升,张静. 沙博理:中国当代翻译史上一位特殊翻译家[J]. 东方翻译,2011:45-47.
- [5] 沙博理. 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J]. 中国翻译,1991(2):3-4.
- [6] 沙博理. 让中国文化走出去[N]. 人民日报,2010-02-03(8).
- [7] 张经浩,陈可培. 名家名论名译[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22-325.
- [8] 张中江. 著名翻译家沙博理:我的根儿在中国[N/OL]. 中国新闻网,(2011-03-10)[2014-02-10].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3-30/2940435.shtml>.
- [9] 许钧.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 中国翻译,2003(1):6-11.
- [10] 陈大亮. 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 中国翻译,2005(2):7-9.
- [11] 许钧.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3):291-293.
- [12] 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20.
- [13] 谢天振. 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341.
- [14] Sidney Shaprio. Outlaws of the Marsh[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0:1136.
- [15] Sidney Shaprio. Outlaws of the Marsh[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9.
- [16]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New York:Routledge,1992:15.
- [17] 李晶. 翻译与意识形态——《水浒传》英译本不同书名成因探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48-50.
- [18] 沙博理. 《水浒传》的英译[J]. 翻译通讯,1984(2):29-32.

Study on Sidney Shapiro's Transl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ZHU Anbo, ZHANG Huiyu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Sidney Shapiro is a translator with a special culture identity. His translation works are unique. After analyzing his translation works and translation thoughts, the author finds that intersubjectivity is reflected in his translation considering his choice of original work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his respect for target readers. Finally, the important role of translator's intersubjectivity in Chin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n be better seen after studying Sidney Shapiro's speci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Keywords: intersubjectivity; Sidney Shapiro; translation; culture identity

(责任编辑:沈建新)